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您永远活在我們心中

一九七七年元月

一年前，巨星陨落，四海悲痛，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八亿人民的眼泪和周总理的忠烈骨灰一起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

今天，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坚决果断地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举国欢腾，人心大快。使我们能够充分表达对周总理的无比崇敬和无限怀念之情，能够尽情歌颂周总理的光辉业绩。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们翻印了此份材料，并加以增补，供同志们参考学习。这是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也是对“四人帮”的愤怒声讨！这些材料虽然仅仅是周总理伟大一生中光辉事迹的极小部分，但也可以看到周总理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辉一生。

敬爱的周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丰碑赫赫巍然耸。“四人帮”反对，陷害周总理，只能使敬爱的周总理在亿万人民心中的形象更加光辉更加伟大。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四人帮”疯狂反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滔天罪行，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

敬爱的周总理，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敬爱的周总理，您永远活在八亿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心中！

一九七七年元月于青城

纪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

目 录

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

..... (1)

周恩来同志在五四运动中的革命活动

..... (2)

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

..... (6)

在周恩来同志身边的日子

..... (15)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在延安欢迎会上

周恩来同志的演说词(摘录)

..... (18)

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

..... (19)

新华日报的回忆

..... (31)

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

..... (33)

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在陕北

..... (39)

周副主席抬担架

..... (40)

抢救	(41)
——周恩来总理的故事	(41)
把革命传统精神告诉青年一代	(43)
——记周总理在上海会见老战友的欢乐幸福时刻	(43)
随周恩来同志踏勘长江三峡记	(46)
周总理在我们食堂	(47)
和周总理在一起劳动	(48)
周总理深夜在黄河大桥工地	(49)
和周总理意外的会见	(51)
周总理给我们当裁判员	(54)
周总理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	(55)
周总理关怀着我们的劳动锻炼	(55)
北京五千师生誓师赴朝鲜前线 周总理来北大作重要指示	(57)
周总理视察清华大学	(58)
周总理和留苏学生一起过春节	(59)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新疆探望知识青年 勉励他们毕生献给祖国边疆建设	(60)

周总理同疾病进行顽强斗争 一直坚持工作	(63)
周总理在第一次亚非会议	
——亚非会议日记	(64)
周总理同苏修叛徒集团坚决斗争的片断	(73)
周总理访问十四国	(74)
“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攻击陷害周总理罪恶滔天	(77)
“四人帮”是陷害周总理的罪魁祸首	(78)
“四人帮”疯狂反对周总理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81)
怀念周恩来总理 批判吸血鬼江青	(84)
“四人帮”陷害周总理十恶不赦	(87)
愤怒声讨和控诉“四人帮”及其黑干将 迟群、谢静宜疯狂反对周总理的滔天罪行	(88)
愤怒批判“四人帮”及其心腹迫害周总理的罪行	(90)
“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一颗所谓“重磅炸弹” ——声讨王张江姚反对刊登回忆周总理的文章的滔天罪行	(92)
“四人帮”永远扼杀不了八亿人民对 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怀念	(94)
人民的好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 ——八三四一部队追思敬爱的周总理	(100)

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加强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

（摘自《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1976年1月9日
《人民日报》）

周恩来同志在五四运动中的革命活动

一、周恩来同志回国主办《学生联合会报》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天津，立即激起了青年学生的愤怒，纷纷起来响应北京同学的爱国运动。1919年5月23日，天津十五个中等以上的学校，约有一万多名学生举行罢课，并发表罢课宣言，散发传单，同时电北京反动政府提出爱国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立刻得到了天津工人和爱国市民的支持，大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在天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不甘心失败，7月初省教育厅长王章楷，召集了天津各学校校长的会议，企图釜底抽薪，消灭学潮，决定提早放假，并推迟开学。有的学校还要求学生家长约束学生参加爱国活动。

当时学生多是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他们参加五四运动只是凭一股爱国热情，究竟应该如何坚持斗争，心中无主，所以一经学校和家庭阻挠，有一部分学生，认为卖国贼已罢免了，巴黎和会已拒绝签字，运动已进行了两个多月，没有什么可干了，斗争情绪松懈了。可是全国爱国运动正在高涨。天津学生联合会感觉到情况不对，极力想法维持学联的爱国活动，并鼓动骨干分子集中办公，都搬进南开中学居住。

就在这样情况下，周恩来同志从日本回国了。他原是南开学校的学生，在学校时曾组织“竞业乐群社”。在他领导下，“竞业乐群社”团结了许多同学，互相督促，共求进步。他毕业后去日本读书已两年了。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的阴谋，深知日本帝国主义具有极大的野心。他认为救国的任务是伟大而长期的。周恩来同志回国的消息，很快传到南开中学，这就使南开中学放假后的冷清气氛，立即活跃起来了。同学们欢欣鼓舞地跑去看他。

根据周恩来同志和学联负责人马骏的提议，学联评议会决定筹办《学生联合会报》。目的是：进一步唤起民众，鼓吹爱国运动，继续揭露反动政府卖国的阴谋，通过自己办的报纸说话，不再受那些报馆、电报局的限制。学联邀请周恩来同志主编《学生联合会报》。

为了解决印刷问题，周恩来同志亲自到荣业大街协成印刷局，找到那里的工人，向他们说明来意。工人们听说要办救国的报纸，个个兴奋异常，保证要多少印多少，决不延误。

7月21日，《学生联合会报》出版了。周恩来同志以“革新，革心”为题写了第一期会报的社论，提出了要改造社会和自觉地改造思想的主张。这给予同学们以极大的启发。许多同学都争相阅读。

周恩来同志主办《学生联合会报》以后，《学生联合会报》不仅成为爱国宣传的有

力工具，而且，自然地成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工具。

《学生联合会报》不断揭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野心和种种阴谋，又不断揭发卖国政府屈从帝国主义，压迫人民，媚外辱国，呼唤人民奋起，打倒封建官僚统治。会报使许多学生不安心放假休息了，纷纷跑回学生联合会要求工作。

《学生联合会报》在周恩来同志主编下，影响很大，很快由三日刊改为对开一大张的日报，每期日销二万份以上。

二、“觉悟社”的诞生

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上海、北京出版了《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天津青年的思想和全国青年一样，更加活跃起来了。

9月初，周恩来同志和赴京请愿的天津学生代表一同乘火车回津，在旅途上，他们漫谈起今后怎么办？周恩来同志提出：要改造社会，必须要从根本解决。大家很同意这种看法。周恩来同志又提出了积极的建议：要根本改造，就需要唤起学生和民众的觉悟，不能伸着脖子等待反动政府杀戮。我们要把有这样志愿的人，都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同时出版刊物来鼓吹、号召，统一大家的意志。只要广大群众起来了，社会就不愁不能改造。这时有人建议：把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学生联合会合并，共同行动。周恩来同志很赞成这个意见。并倡议由两个会的一些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比学联组织更严密的小团体，同时出版一个宣传刊物，大家十分赞同。于是，一个新生的革命青年团体就酝酿开了。

9月16日上午，在草厂庵学生联合会的办公室里，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等二十个男女同学中的积极分子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周恩来同志宣布开会。他说：“今天到会的人，有些彼此还不太熟悉，先请女社员自我介绍一下。”郭隆真逐个介绍女社员：“邓颖超，女师同学，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长，我们的小妹妹……”。男社员接着介绍：“马骏，吉林人，学联副会长；周恩来，号翔宇，《学联日报》主编……”

周恩来同志首先说：我们今天到会的人，都是受了二十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对中国社会要从根本解决，也就是要把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等等，全都加以铲除、改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结成团体，出版刊物，以求改造学生的思想，进而唤起劳动民众的觉悟，来共求社会的改造。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的十项决议，决定这个革命团体叫“觉悟社”，出版的刊物取名为《觉悟》。

最后周恩来同志建议：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同志来“觉悟社”和大家见面，并作公开讲演。这博得了全体的掌声。因为李大钊同志在大家的心目中是新思潮的号角。

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同志应邀来天津讲演，维斯理堂的大厅挤满了听讲的群众。他告诉人们：今天的世界是民主主义胜利的时代，是庶民胜利的时代。这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什么专制主义，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都要打倒……。

当天下午，李大钊同志来到了学联会议室，听了周恩来同志介绍“觉悟社”成立的情况，非常赞许。他还建议：要多了解苏俄，取得了真理，就要贯注在行动中……。

《觉悟》刊物在1920年1月20日创刊。在这期创刊里，周恩来同志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发刊词，题目是《觉悟》，一篇是《觉悟的宣言》，在这两篇文章里，指出：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男女不平等、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应该铲除，应该改革”。

11月10日，赴京第三次请愿代表被卖国政府逮捕释放回津以后，许多社员思想又进一步开展了，感到当时做文化运动宣传的人多属空谈，切实行动的人太少。12月27日，在“觉悟社”的一次会上，周恩来同志归结大家讨论的意见，提出“觉悟社”应该成为一个预备牺牲奋斗的组织，一个天津作战的“大本营”。

“觉悟社”的集会常常是周恩来同志主持的，他讲国际国内形势，讲日本侵略我国的野心和阴谋，加深了社员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切齿仇恨。他也讲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我们的指南针，引起了社员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憧憬。

《觉悟》上发表文章，都不具自己的名字，用号码代替。二十个人，写了五十个号码抽签（准备继续发展社员）。周恩来同志是五号，所以他就叫“伍豪”。邓颖超同志是一号，所以她又叫“逸豪”。周恩来同志留法勤工俭学时写信回来，还用“伍豪”的名字。邓颖超同志在抗战时期还用过“逸豪”的名字。

“觉悟社”的成立，在天津学生运动史上占有重要意义的一页。它在当时成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

三、双十节示威与“一·二九”爱国运动

为了支持山东人民爱国运动，和营救第三次赴京请愿代表，“觉悟社”决定借庆祝双十节，举行示威游行。

1919年10月10日中午，在南开广场举行市民大会。大会结束就宣布游行。果然不出所料，大批武装警察包围了整个会场。邓颖超同志领导大队最前列的女学生向警察宣传：“警察是中国人！”“警察也要爱国！”“不打爱国学生！”“冲啊！”邓颖超同志大喊一声，首先冲上去，其他女学生也紧跟上来向前闯。这时警察动武了，用枪托殴打学生。女学生们抡起手中小旗的旗杆应战。一个警察的帽子掉了，怕脑袋挨打，弯腰去拾。邓颖超同志看见了，高喊：“打帽子！”警察的帽子应声掉了一地。一群女学生趁机冲过了两排警察。正在搏斗的紧急关头，学生联合会的汽车宣传队来了，里外夹攻，打开了一个缺口。游行队伍紧跟着汽车突破重围，浩浩荡荡进行环城游行。

1月29日下午两点，各校学生一千多人纷纷集合于东马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进行街头讲演，散发传单以后，就去省长公署请愿，提出要求的条件是：驳回日本通谍，拒绝青岛直接交涉，催办福建（惨案）交涉，取消中日军事协约，撤消对天津学联的查封，释放被拘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到达省长公署后，群众公推周恩来同志为总代表同其他三个代表去见省长。代表们一进门就挨了打，被软禁了。省署外面学生大队更加气愤，坚持斗争，直至日落。这时一千多名赤手空拳的男女学生也被军警包围了。周恩来在墙内登上梯子，看到外面同学被军警大队包围，即责问公署副官为什么无故派兵包围学生。副官无言可答。反动政府看到学生的威力可畏，立即下令用

刺刀、枪托进行武力镇压，驱散学生，演成了流血惨剧。当二百多名武装警察将被捕的周恩来同志等四位代表押送营务处时，沿途军警密布，周恩来等同志不断高呼爱国口号，群众以热烈的鼓掌表示敬佩他们英勇不屈的爱国精神。

从1月23日到1月29日七天内，反动统治者先后逮捕了各界爱国人士共二十八人，他们被分别拘留在警察厅、保安棚、侦察队里达半年多时间。在拘留期间，周恩来等同志领导大家以绝食等方式进行了反抗斗争。

四、铁窗中坚持斗争

监押在警察厅里的代表被剥夺了一切自由。反动当局既不正式审讯他们，也不释放他们，而是采用了干耗的办法：用时间来消磨人们的锐气和斗志，囚禁群众领袖，以消灭群众运动。

周恩来同志和马骏利用晚饭以后、睡觉之前的一二十分钟到厕所里去，先是个别串联，后来互相通报消息，越聚越多，以致形成了全体集会。

一天晚上，大家分散回去时，每个人手中都多了一张纸条，打开一看，上面用铅笔写着：“质问警厅，既不审问，又不释放，是何道理？”第二天警察厅长杨以德来各个监房巡视时，个个都厉声质问：“警厅捕人，依何警章规定？为何不公开审判？”他无理可讲，吱唔几句连忙退出。

由于被捕代表的坚决斗争和全国各地的抗议，警厅不得不逐渐放松对被捕代表们的管制，允许他们到院中散步和互相串门。周恩来同志和马骏对当前的斗争交换了意见，认为应该利用目前机会，动员大家多读些新思潮的书，这样才可促进觉悟，坚持斗争。

设法弄到了书刊，大家便请周恩来同志讲解马克思传，他讲得很认真，大家也如饥似渴地聆听他的讲解，自觉地形成了一套学习纪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却比明文规定更有效力。

4月1日晚上，代表们秘密串联决定：自4月2日起，全体绝食，要求更大限度的自由，要求立即开庭审讯。次日早饭，大家滴水未进。杨以德连忙请示上级，决定用惩办和利诱的办法，双管齐下，但刚一施展，就被代表们砸得粉碎。正在这时，邓颖超同志等二十四位自愿前来换代表绝食的学生，带领了大队学生再次包围了警察厅，他们见到杨以德就说：“快把我们关起来，我们来换代表绝食。”“我们要求官府在今天下午一定答复。要是代表们饿坏了，官府要负全部责任。”10月10日群众围攻警厅的情景，马上又映现在杨以德的眼前，他被迫说：“行，行，放心吧！”

吃饭前，杨以德的副官向代表们宣布：“答复诸位的要求：可以在院内自由活动，最近就开庭审讯。”代表们这才开始进食。

7月6日到8日，天津地方检察厅连续开庭三天。列席旁听的群众有五百多人。“觉悟社”的战友都来了。

周恩来同志和马骏、郭隆真等走上被告席。审问一开始，审问者和被审问者的地位一下子就倒置过来。周恩来同志等不仅斥责得法官满脸流汗，而且把这里变为传播真理的讲坛，向许多听众揭发了反动政府卖国的罪恶勾当。爱国的律师为被捕代表辩护说：

“如果政府说他们是触犯了小日本的刑律，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我却知道这样一点——日本的刑律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听众发出哄堂的笑声，窘得法官红着脸皮，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一场审讯，草草收场。

7月17日，代表们又被押往审判厅，当着大家宣读了判决书。周恩来同志被判为所谓“骚扰罪”。根据被告人于未决前，期内羁押日数均准折押的惯例，恰好这天到期，因此二十一位代表，全部当庭释放。

当代表开释的消息传出后，天津人民欢欣若狂，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立即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慰问团和九辆汽车，到审判厅前迎接。

五、走向革命的新途程

被捕代表释放后，8月初，“觉悟社”就召开了全体会议。会上周恩来同志总结了一年多天津青年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与教训，指出今后的救国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并把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的中国。并建议赴北京请李大钊同志给以具体的指示。

8月16日，在北京陶然亭，天津“觉悟社”和北京“少年中国学会”等四个团体的代表与李大钊同志会见。李大钊同志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好团结一致。指出：主义不明，在内即不足以使各团体今后进一步团结。

会后不久，1920年秋天，周恩来、郭隆真等同志为了探求革命真理，启程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根据以下两书有关章节整理：

《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

《五四运动话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61年。

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

一、给周副主席当警卫员

1934年8月，我调到中央局工作不久。有一天，我们的李队长找我谈话，说要把我调到总部去工作。第二天上午，总部的一位参谋对我说：“调你到这里来跟周副主席当警卫员，我带你去见首长。”他带我来到周副主席的办公室，这时首长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文件。仍和一年前我初次看到他的时候一样，所不同的是那身灰军衣已成了白的，显得更旧了。首长收拾一下桌上的文件，站起来，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魏国禄”，我回答说。“是从哪个单位调来的呀？”说着走到了我的面前。“从中央局。”

“十几岁啦？”“十八岁。”“是党员还是团员？”“是党员。”副主席满意地点点头笑着说：“很好”。接着他把早已站在门口的警卫员范金标同志叫进来对他说：“工作问题，你们两个商量一下，分分工，没有事情的时候，好好学习。去吧，带他看看住在哪里。”我向首长敬了一个礼，就随范金标同志走出了办公室。

十月初，周副主席把我和范金标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们最近要出发，要走很远的路，让我们把东西收拾一下，不必要的东西统统交回供给部，这一下可使我和范金标为了难。副主席哪一样东西是不必要的呢？两条毯子，一条被单，作枕头用的包袱里还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最后只好在那些旧书报杂志上打主意。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十月十八日下午，我们跟着周副主席从西岗梅坑出发，向着零都方向前进。从此便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二、严惩放火者

1934年11月，长征的红军进入了广西苗族居住区。奇怪得很，自从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十几天以来，每天晚上都有红军住的地方着火。苗族弟兄的房子全部是草和木头盖起来的，一烧一大片，有时一个村、几个村都烧成了灰烬。

有一天，我们在龙坪镇宿营。这天晚上，周副主席是长征以来少有的休息比较早的一个晚上。经过一天长途行军，我们也很快进入梦乡。夜间十二点左右，我被哨兵的叫声和“辟辟巴巴”的着火声惊醒，爬起来一看，周副主席住的房后边火光冲天！黑烟和股股火舌从副主席的房门口、窗口往外直窜。我窜进了首长的房子。这时，他正在向外摸，但房内已成了烟和火的世界，根本睁不开眼睛。我不顾一切领着他从房内跑了出来。不一会，这间房子被熊熊的大火吞没了。

周副主席刚出来，马上就派我们去看其他首长和了解部队的情况。正在这个时候，其他首长也急足赶来。几位首长在露天下站着开会。周副主席在会上说：“可以肯定这火是敌人放的。万恶的反动派企图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证实他们那种‘共产党人杀人放火’的无耻谣言，来挑拨破坏我们与群众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把放火者查出来，彻底揭穿敌人的阴谋！”会后，当天夜里在龙坪镇就查出三个坏家伙。经过保卫部门审讯证实，他们是被国民党收买、指派的特务、地痞和流氓，专门混到我们红军宿营地，乘人不备时放火的。

查出了着火原因，找到了放火者，第二天国家保卫局在龙坪镇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向群众宣传、讲解了红军的政策，彻底揭穿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当老百姓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无不气愤填胸。根据群众的要求，当场就将这三个坏蛋枪毙了。同时，周副主席还责成供给部调查并且赔偿了群众的损失。

从此，敌人这条放火的毒计，以他们自己的失败而告终了。

三、副主席磨稻谷

1934年12月间，中央红军长征到了贵州。在进入贵州边界的初期，由于国民党的反

动宣传和地方反动势力的破坏，老百姓都不敢接近我们。每到一村，很难找到人，吃的东西就更加困难，连脱米用的水磨、石臼，敌人都强迫老百姓藏起来或破坏了。阴险的敌人企图用这种恶毒办法来饿死我们长征的红军。

有一天宿营以后，部队搞到了一部分稻谷，可是没有工具磨，脱不出来，怎么办呢？有些同志走了一天路，很疲劳，看看没有吃的，索性算了，倒头就睡。周副主席看到这种情形非常着急，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在会上他动员干部：“一定不能让大家饿肚子，我们要想办法叫同志们吃上饭。没有东西磨稻谷，就动员大家用石头、瓦片搓，就是用手搓，我们也要把米脱出来！”会上决定，每人要想法脱出够三顿吃的米来。会后，周副主席叫我给他找来了两块瓦片，自己领来稻谷，就在瓦片上搓起来了。我对他说：“首长，您不要搓了吧！”他头也没抬反问我一句：“为什么？”“您是首长，还有更重要的工作。”我似乎满有道理地说。“正因为我是首长，才更应当搓呢。”接着他又说：“我提议让大家动手搓米，自己怎么能不搓呢？再说，搓米是为了吃饭，谁能说吃饭不重要？”给副主席这么一说，我也就没有什么话讲了。

在周副主席的号召和影响下，整个村子的部队都在搓米，有瓦片对瓦片搓的，有石头对石头搓的，有人干脆就用手搓。手上搓出了血泡，仍然愉快地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每个人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圆满地解决了吃饭问题。

四、“饭撒了是小事”

一天，在贵州境内行军。这天行程八十里，宿营地是土城。下午三点多钟，离宿营还有二十几里路的时候，人们已很疲劳。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股敌人从山上冲下来。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毛主席、周副主席都亲临战场指挥部队作战，花了很大代价，才打垮了敌人。敌人虽然被打垮了，但土城已不能再住，只好连夜继续前进。

这天夜行军，我跟挑夫一起走，以便看管副主席的文件。首长和范金标在前面走了。我手中提了一个三层的饭盒子，里面放着出发时给副主席带的一餐饭，因为打仗，他没有顾上吃，就又连夜出发了。我知道他一天没有吃饭，早就饿了，想赶到前边送给他。我跑了不远，一不小心，绊在一块石头上，饭撒了个净光。我的嘴、手、腿也摔烂了。后半夜一点多，我赶到了首长的身边。范金标一看见我上来了，就高兴地迎过来说：“快拿饭来给首长吃。”我说“摔了一跤，饭撒光了。”“摔的怎样？能走不能走？”周副主席看我擦掉了一大块皮肉的腿，“饭撒了是小事，看你摔成什么样子啦！”接着又叫范金标找卫生员来给我上药。副主席虽然没有为饭盒的事批评我，可他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呢？卫生员给我上完了药之后，我问首长：“我身边挎包里还有一点锅粑，您是不是吃一点？”他说：“有锅粑？很好，拿来吃一点。”

五、一个负伤的红军

1935年2月，我跟着周副主席从遵义出发，向云南地区前进。有一天行军快到松坎的时候，忽听路旁树林里有呻吟声，副主席立即停下来，转弯向着呻吟声走去。到跟前

一看，是一个负伤的红军战士，平躺在一棵树下，浑身污泥，脸色苍白，紧咬牙关，两腿一阵阵抖动，看样子伤势很重。副主席在这个负伤的同志跟前蹲下来，用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叫我拿出仅有的一杯热水，慢慢地给他喝下去。从伤员自己的叙述中，知道他在昨天晚上追击敌人的时候摔坏了腿，右膝盖上一片血肉模糊，都露出了白骨。副主席关怀地抚摸他的伤处问道：“疼不？”他回答说：“不疼”，并且坚决地说：“能走。”说着就很艰难地抬腿想起来。但身不由主，他如何能抬得起来呢？副主席急忙按住地说：“你伤成了这个样子，怎么还能走呢？”“警卫员，叫担架来。”副主席一手扶着负伤的同志一面回头喊我。

我把担架叫来，副主席亲自把那位伤员同志扶上去，还在他身上盖了一条毯子。副主席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手是那么轻，动作又是那么慢，唯恐触动他一点，引起他的痛苦。看来，这与他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果断利落性格是多么不吻合呀！我为首长这种伟大的阶级友爱，感动得几乎流出了眼泪。当副主席叫担架抬起走的时候，那位伤员用手擦了一下眼泪，象入党宣誓那样庄严地对副主席大声地说：“我伤好以后，一定要多杀敌人，来报答首长对我的关怀！”声音是那么宏亮，语调是那么坚决，听起来使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个身负重伤、刚才还在呻吟的人。党的关怀，给了他多么巨大的力量啊！

六、周副主席在病中

1935年6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突破了敌人重兵把守的四道防线，胜利地渡过了号称“天险”且有敌军阻挡的金沙江、大渡河、乌江，翻过了海拔四、五千公尺的大雪山，进入了四川的毛儿盖、卓克基一带地区。

我们同周副主席先到卓克基，后又移住毛儿盖，听说在这里要休整，我们真是喜出望外。的确需要休息了。周副主席在长征以来半年多的时间里，根本就没有休息，白天和我们一样的行军，晚上住下又要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睡，第二天仍照常行军。有时我们看到副主席太累了，劝他休息，他总是温和地说：“好，我做完这点事就休息。”但他的事情哪里有做完的时候呢？住下以后，我们给他烧了些水，让他擦擦脸，洗洗脚，以减少些疲劳。他说：“等一等，我马上就洗。”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他仍聚精会神地在工作，根本没有要洗的意思。吃饭也是如此，有时干脆边吃边看文件。他睡眠简直少到惊人的程度，有时几夜几夜的不睡。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眯一会，抬起头来接着又工作。就这样，副主席在繁忙的工作、紧张的战斗、行军中，身体一天天消瘦下来，本来就不短的胡子，显得更长了，只有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

在毛儿盖休整，周副主席的工作不仅没有因此消闲，反而更加紧张了。天天开会，除去研究过草地的问题外，更多的时间是在做说服、争取张国焘的工作。但是，这个可耻的叛徒并没有因为党的耐心教育而有所转变，终于在开始过草地的时候与党分裂了。

一天，周副主席回到住处，范金标把准备好的晚饭——仍然是天天吃的青稞麦、豌豆苗，端出来请首长吃饭。他说：“不想吃，你们给我端杯开水来吧。”我端来开水，他已摊开了文件，照例晚上在那个微弱的灯光下办公。我放下开水，副主席叫我去休息，并说他马上也休息。我出来不久，看到他办公室里的灯也熄灭了，我很高兴，心

想：今晚副主席休息的挺早。但过了不到一个钟头，就听他叫我，我急忙走到他跟前，他才说再要杯开水。我听他的声音与往常不同，就问他：“您是不是不舒服？”顺手一摸，我惊叫了一声，“首长在发烧！”这时范金标、曾照贤等同志也起来了，请来医生，一量体温三十九度五。

第二天，烧的更高，整天昏迷不醒。毛主席和李富春等首长都来看他，看到副主席病的那样，都很着急，毛主席问当时的卫生部长贺诚：“傅连璋能不能回来？”（随总司令率领的五、九军团南下了）贺诚同志说：“电报上说回不来，太远啦。”毛主席指示贺部长打电报叫个医术高的医生马上到毛儿盖来。很快就来了一位姓戴的医生，据说是跟罗炳辉同志从江西吉安出来的，医术很高。我们都为有这样一个好医生感到高兴。

按照医生的吩咐，我们几个警卫员轮流从山上搞些雪来化成水，泡手巾给首长做冷敷。第三天首长的体温就逐渐下降了，神智也清醒了一些。毛主席每天都来看周副主席，每次都嘱咐我们好好地照顾副主席。到了第四天，副主席的烧全退了，精神也好了一些。毛主席和其他首长来看他，也能坐起来说话了。首长们都很高兴，不知哪一位首长很有风趣地说：“在这种条件下生病，能好了，真要感激马克思在天之灵。”引得大家都笑了。

周副主席的病刚刚好一点，但也只能坚持坐在铺上，就叫我们拿文件、书报给他看。我们深深了解首长的心情，知道他学习已经成了习惯；行军如果骑马，他手里一定拿一本书，边走边看。如果闲着没事干，对他来说简直好像是灾难。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我们不能完全照顾他的习惯，尽量地少给他一点看，劝他多休息。有时他就给我们讲故事，讲革命道理，讲当前的国内外大事，教导我们多学习。

首长刚好一点，离出发只有两天的时间，我忽然发烧病倒了。副主席自己病还未好，知道我病了就来看我，叫医生给我打针、吃药，象慈父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我。在首长的关怀和医生的治疗下，出发前我就好了，但出发时首长一定要我骑着他的马走。

七、过 后 河

1935年8月中旬，中央红军分别由毛儿盖、卓克基等地出发，向着那荒凉无际的草地挺进。踏入草地，向四外观看，真是天连草，草连天。自从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英勇的工农红军战士进入草地之后，给这荒无人烟的草原世界增添了不少生气。

进入草地的第三天，我们要过一条叫做后河的水流，下午周副主席和我们一起来到了河边。这时天正下着大雨，河水眼望着上涨。部队正准备渡河的时候，突然从右前方插下来一股敌人的骑兵，向我们进行袭击。幸亏陈赓同志率领的干部团及时予以迎击，才未招致损失。周副主席见此情景，不顾自己的病体，赶忙从担架上下来，叫人先下去试水。试水的同志走到河中间，水已齐胸，不但水流急，而且河底淤泥下陷，那个同志摇晃了几下，差一点被水冲走。周副主席叫他赶快上来另想办法。这时陈赓团长打退了敌人的武装袭击以后也回到了河边。首长叫他动员大家解绑带、结绳子，派会水的同志带着绳子的一端游过河，让部队顺绳而过。第一次因绳细人多水流急，刚过了三批人，绳子就断了。第二次周副主席又指示结了很粗的一条绳子，叫每次少过一点人，这样部

队才渡过了后河。

部队在渡河的时候，周副主席一直站在河边看着。看部队过得差不多了，他自己也要同战士一样顺绳徒步过河。这怎么能行呢？水又深又急，而且首长还在病中呀！幸好陈赓同志上去一把拉住了副主席，并说：“首长，您不行啊！”他温和地对陈赓同志说：“可以嘛！大家都能过去，我也可以过去。”“您有病，怎么能行呢？”“没关系。”说着就要下水。陈团长急忙赶上又拉住了他，用严肃的口吻说：“不行！别的事情我绝对服从首长，这一次得听我的。首长还是坐上担架吧。”这时旁边的一些同志和陈赓同志的心情一样，也提出了意见。首长无可奈何才坐到担架上。

我们过河后，后边又上来十几个小同志。看他们的年龄和个头，即使有绳子也很难过这条河。周副主席看了看对岸的小鬼们，叫我：“魏国禄，你骑上牲口把他们接过来。”我一过去，小鬼们高兴极了，争着要上牲口。我说：“一次只能上三个。”他们过河心切，根本不听。骑不上的，就抱着牲口的脖子，拉着牲口的尾巴，一次带过五六个人，就这样我来回接了三四次才把他们全都接过来。小鬼们过来以后，围着首长问长问短，有的感动得流着眼泪对周副主席说：“多谢首长对我们的帮助和关怀！”副主席轻轻地拍拍他们的肩膀鼓励说：“你们都是小英雄，加加油，过去草地就是胜利！”这些年青的红色小鬼们，带着党的关怀和鼓励兴高采烈地又踏上他们的行程。

八、和周副主席生活在一个党小组里

1935年8月底，红军克服了种种困难，胜利地渡过了草地，来到了两河口一带地区，部队在这里休息了几天。乘这个机会，总部机关的党组织进行了一次整顿，改选了支部，随之各党小组又选举新的小组长。

我们那个小组里有周副主席和张云逸同志，还有司令部的几个参谋。在一次小组会上，张云逸同志提议选我当小组长，周副主席含笑望了望我说，“很好，同意。”大家也都表示赞成。这一下可把我闹得很难为情：上有政委（周副主席是红军总政治委员），参谋长，下有参谋，我是个警卫员，怎么能当小组长来领导他们呢？我红着脸说：“我干不了，最好还是另选别的同志。”

周副主席见我不愿当小组长，就动员我说：“大家选你当小组长，就相信你一定能干得了，我们既然同意你，就会服从你的领导，今后小组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商量嘛！”停了停又问我：“怎么样，同不同意我的意见？”我看样子不当是不行，民主嘛！少数服从多数，我只好答应，从此我就当了我们那个小组的小组长。

在选举小组长以后，根据支部的指示（当时的支书是康克清同志），还要研究小组今后的任务。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周副主席发表了意见，他说：“现在是长征，我们小组应当保证没有一个掉队的，都走到抗日的最前线去。因此，在行军中要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互相帮助……。”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我们就决定把“保证一个不掉队”当作小组在长征过程中的主要任务。在后来的行军中，由于副主席的模范作用和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那个小组确是没有一个掉队的，都胜利地到达了陕北。

在长征途中，周副主席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但是就在这紧张、繁忙的战斗、行军

中，他仍然很重视过党的组织生活。有一次我照顾他吃饭，他忽然问我：“小组长同志，我们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小组会呢？”“开过啦。看到首长很忙，没有通知您。”我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唉，那怎么能行！我是个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确实有事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可是你的不对呀。”我根本没有想到问题会这样严重。在我看来一个首长少开次把小组会又算得了什么？而周副主席却为此用平常少见的严肃态度，认真地向我提出了批评。最后他又很亲切的口吻对我说：“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党性问题，以后开会可一定要通知我啊。”接受了这次教训，每次开会我都告诉他，而他只要有时间，每次都参加，并且很认真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到了陕北以后，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擦桌子，他从外边进来，一边摊开文件准备办公一边对我说：“小组长，这个月党费我还没交吧？”

“已经交了，我代首长交了五分钱。”

“你交是你的，党费怎么可以让别人代交呢？”

“首长集中精力忙国家大事，我们代交还不是一样吗？”我满有道理地争辩说。

“国家大事重要，交党费也重要，因为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

我干了半年多的小组长，当然谈不上对别人有什么帮助，但我自己却在这个职位上受到了许多教育，尤其在党性锻炼上，党的负责同志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九、终生的感激

从两河口出发，第一天行军我就害了疟疾病。为了不使副主席发现我在生病，给他增添麻烦，我故意落在队伍的后边走。有一天行军，离宿营地还有十几里路的时候，我发起了高烧，又勉强走了不到半里路，实在支持不住了，我就躺在一个水塘边休息。不知昏迷了多长时间，也不知是什么动静把我惊醒了，抬头一看，从路边树林子里出来了十几个当地人，手持武器向我这里走来。我心想：完了，掉队的红军就怕这些人。他们为了抢你的东西非把你杀掉不可，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死在这些人的手中。想到这里，要自卫的本能使我头脑清醒了，立即抽出了驳壳枪。

正在这时，一军团的部队赶上来了。那些人看到大部队，便“依里瓦拉”的嚷着跑回了树林子。这时过来了几个同志，接去了我的背包。一军团十三团的团长还让两个同志架着我，才慢慢地走到了宿营地。

周副主席知道我病在路上，很着急。等我回来了，马上就来看我，象父亲抚摸着在外边摔伤了的孩子一样，用既心疼又怪他不小心的那种语气责怪我说：“你怎么搞的，病了也不讲？”我能向首长说什么呢？不一会，周副主席亲自给我端来一碗洋芋，并嘱咐我：“吃点东西，好好休息，明天骑牲口走，不准再跑到后边去！”我望着首长那慈祥的面孔，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害疟疾刚好不久，我的脚又出了毛病。肿得象个馒头，一迈步真是疼痛难忍。在我害脚病的日子，周副主席一直让我骑着他的马，而他自己和大家一样的走路。我骑在马上，看首长拖着他那病愈不久的消瘦身体在地上走着，心如油煎一样的难过。多少